**王国维**

王国维是**20世纪初期**杰出的**史学家**，在1917年取得了确证殷商君王世次的重要学术成就。1925年，他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命题，成为学术史上被多数人评价极高的**史学方法**。

**二重证据法**

1913年，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

1925年在《总论》中重新提出“二重证据法”理念，“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评判：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实际不过是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证原有的文字材料，仅强调“印证”而排斥否定，具有片面性和学术思想的守旧性。

与“古史辨”：仅强调“印证”而排斥否定，具有片面性和学术思想的守旧性。

作用：从史学史角度考察，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史学发展的作用，是将旧的上古史体系与新史学的建设过早地衔接起来。但在旧史学的糟粕未能充分清扫的条件下，这种传统史学过早而且以不适当方式衔接于新史学，携带了大量庞杂成分、落后理念、虚假记述，降低了新史学发展的健康环境。

**疑古**

对经典的否定

**信古**

信古一派（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尊古一派）则对疑古派持拒斥的态度。这派学者一般都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素养，对之亦有深厚的感情。针对疑古学派对经典文献的否定，则持拒斥的态度。

对经典尊信

**释古**

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最为著名

对经典证信

**庶人经学**

事实上，不是经典因圣人而成经典，而是圣人因经典而成为圣人。故经典不再也不必是圣人的经典，而是庶人的经典，经学也不必是圣人的经学，而是庶人的经学，发现其在庶人历史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

**默证**

“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运用“默证”方法的思想根基和出发点，是“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即凡使用默证法，都是设想凡事皆会记载，并且凡记载都会留存。

**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造成”准确来说应该是“**生成**”

**集体记忆**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奠定了现代西方记忆理论的基础

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先后师从柏格森和涂尔干，他融合二人的思想，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认为**所有记忆都受到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和形塑**。在“集体记忆”理论中，涂尔干的外部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与形塑替代了柏格森的个人内在自由主义;而涂尔干由分析外部社会事实来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则被转化为对人内在客观记忆结构的研究。

**离开了他人或集体，个体将无法记忆。**

“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主要区别：一是集体记忆是目前持续的思想，它的持续性不是人工的，而是自然地保持能够存活在集体意识中的过去。而历史记忆总是将过去分成不同时期，而每个时期总是对社会综合分析，以突出它与其他时期的差异性。二是历史记忆记录过去，而集体记忆保存传统;哈布瓦赫甚至认为“历史是单一的，也可以说仅有一个历史”;集体因成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记忆，一个集体中往往又会分为不同层次的小集体，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多重性。三是集体记忆对过去一般没有明确清晰的时间，它总是在保持过去与目前的相似性中延续，在目前的社会框架和认识中对过去进行重构;而历史记忆则通过编年的方式，将过去并不连续的事件整合联系起来，赋予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借助理性，对过去的事件、观点进行选择，与过去和各种集体保持距离，以追求客观地重构过去。

文化记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艺术家阿拜·瓦尔堡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受到耶茨的记忆术“图像”等文化标识储存绵延记忆的启发，“文化记忆”是“机构化的记忆术”。它以“文化科学为研究的对象”，与“交流记忆”相对应，是指通过文化符号、文本、仪式和纪念性建筑等储存和传递的记忆。

社会记忆：后来，韦策尔等人进一步提出“社会记忆”这一概念，来指称人们无意识地“制作历史”的日常实践，试图与文化记忆区别开来。这不仅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造成了概念的进一步纷扰，因为文化记忆有时也被称作社会记忆。